

20世纪90年代女性诗歌的身体书写及文化虚无^{*}

——以翟永明诗歌为例

□董迎春

[摘要] 翟永明90年代以来不断从早期黑夜独白走向了都市空间叙事,女性意识与个体体验的身体在场,突破了早期的那种独白式抒情、自恋式的哀怜,不断把女性的“身体”转向形而上学、知性、综合性、思想性的层面,以此消解生活背后的空虚感,与语言本体的诗体表现意识相融合,提升了女性诗歌的精神实质与文化影响,从她的作品也看出90年代整体物质消费文化转型背后则渗透着浓厚的文化虚无,值得警惕。

[关键词] 女性诗歌;身体书写;翟永明;文化虚无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179(2017)02-0093-06

崛起20世纪80年代“朦胧诗”的,标志着汉语诗歌的现代转型成为可能,其中最重要的是将诗歌推向内部、语言本体的省察与书写。80年代“女性诗歌”成为重要的写作现象,“女性”由以往“被看”转向“看”(沉思)自我的身份。随之,唐亚平、陆忆敏、翟永明等大量的女性诗人出现,形成了80年代的重要文化景观。一般而言,“女性诗歌”80年代出现时是作为“第三代诗”中的“口语写作”一类考察,但是女性群体自身由于教育背景、生活经历、艺术观念等方面的差异,其相异写作表现出复杂性、多元性,到了90年代“私人化写作”的出现,90年代“女性诗歌”则表现更多差异,这也成就了90年代以来的当代诗歌的繁盛与多元。相对于80年代女性诗歌的哲理观照与命运追问,以翟永明为代表的“女性诗歌”更重视探讨城市生活空间的凡俗与诗意,在急速经济与文化转型中,追问自我的存在价值与生命哲学。她们越来越看着“自我”的身体展示,这种私人性的自我身体,加深了她们对自我性别的命运追问与哲理探究,表现出身体书写背后的文化忧患,由于消费生活对城市空间的侵占、市场化竞争等物质因素的影响,“女性诗歌”从80年代的命运“独白”转入了城市叙事,也不断探索出“身体与诗体”合一追求的90年代“女性诗歌”。但是,她们也无法逃离90年代物质消费文化背后所渗透的浓厚的“虚无”意识。

一、身体书写:从独白到叙事

90年代“女性诗歌”,不同的女性诗人进行了差异性的话语探索,因而,把“女性诗歌”仍放在“第三代诗”的“口语写作”当中考察,但事实上90年代末期的“盘峰诗会”将当代诗歌写作分成“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之后,诗歌界内部的分裂越来越明显,而翟永明恰恰游走于两者之间的写作,既与西川、王家新、欧阳江河等“知识分子”时有合作与唱和,也时与于坚、韩东等“民间”阵营诗人在她的“白夜”酒吧文化互动。由此,以翟永明为例来探索她的城市叙事、身体展示及背后的文化意识、性别意识,极具个案反观时代的研究价值。

20世纪90年代的翟永明,由80年代早期“黑夜意识”与内心独白,逐渐走向了对现代都市、日常场景的揭示,拥有非常强烈的城市叙事的现场感、亲切感。她诗中的道具、场景、咖啡馆、舞台、青衣、铙钹、鼓师、笙歌……交错成一幅现代与复古、时尚与怀旧交错的文化空间。干净、凝练的描述语言,蒙太奇式的跳跃,古今时空穿梭的时间意识,深沉、细腻的艺术情怀,这些现代感的、艺术趣味的书写,促成了翟永明从80年代的自

^{*} 收稿日期 2016-12-08

基金项目: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朦胧诗以来现代汉语诗歌的语言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1BZW096)。

我抒情走向更为精致、内敛的内心审智。1995 年,翟永明在《再谈“黑夜意识”与“女性诗歌”》中写道:“必须承认当代‘女性诗歌’尚未完全进入成熟阶段,1986 年至 1988 年‘女性诗歌’有过短暂的绚丽阶段,同时也充斥了喧嚣与混乱……思考一种新的写作形式,一种超越自身局限,超越原有的理想主义,不以男女性别为参照但又呈现独立风格的声音。”^[1](P1129)] 90 年代的翟永明,摆脱了 80 年代学徒期过分张扬女性自我抒情,逐渐转向客观、再现的城市叙事,与 90 年代诗歌整体追求的“叙事性”融合。正是这类差异化、自我风格的写作成就了 90 年代诗歌的“私人化写作”的整体氛围。在《美杜莎的笑声》中埃莱娜·西苏写道:“写你自己。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只有到那时,潜意识的巨大源泉才会喷涌。”^[2](P193~194)] 翟永明《咖啡馆之歌》《道具和场景的述说》《莉莉和琼》《脸谱生涯》《三美人之歌》《十四首素歌》《小酒馆的现场主题》等更加重视“身体”的在场,重视这种冷静、客观的“述说”与再现,并在种种“述说”中呈现“身体”的形而上学的沉思与探析,最终抵达女性身体话语中独特的性别意识、身份意识。

80 年代,翟永明的诗歌通过张扬自我、抒发自我,表现她作为女性的性别意识与强烈的文化参与感。90 年代这种抒情开始节制与冷静,再现女性在当下都市文化空间中的审美态度与内心反应。翟永明从早期对女性性别充满强烈身份认同的身体展示转向了对外部身体的内在化的自我沉思。“身体”作为关注对象,不是激烈的女性疏离,而是与城市空间的密集融合,完成现代女性角色的转型与可能。她所写到的“镜子”“器皿”“舞台”“私密的耳语”等,将自我与“身体”联结的文化意象互为表现,形成生命舞台的景观性、现场感,展示了与他者的观看、对话关系,这就愈发显出她的智力、知性、哲理与情怀,也摆脱了性别的局限与差异,不断超越女性的身体写作与性别局限。

当然,此刻的身体书写仍然是她作为女性身份、性别经验所重点关注的情感基础、文化趣味。“就像写作的欲望一样:一种在自我内心活着的欲望,一种对隆起的腹部的欲望,对语言、对热血的欲望。如果它正好会激发我们的幻想,我们将不会拒绝它。”^[2](P2017)] 都市体验与文化空间的新奇、陌生与可能,成为翟永明 90 年代女性诗歌的表现维度,她在语言本体的诗艺追求中,呈现出一个诗人“自我”这一大身份的文化意识,慢慢解构男性中心为主导的性别话语与意识局限。

二、身体景观与虚无意识

翟永明在献给雕塑家、画家弗里达·卡洛《剪刀手的对话——献给弗里达·卡洛》的长诗中,通过与带有独立而有尊严的弗里达的对话,再现了诗人对独立、自尊、思想、艺术的“女性”的尊重与认同。这种文化趣味,将她从一味地对都市文化空间的女性身体的展示与联想转向了语言本体的诗体、诗学意识。

美国学者赫雷拉传记《弗里达》一书这样介绍她的个性、艺术观念:“弗里达作为画家同时也作为一个人具有这样的秉性:豪侠并勇于面对肉体的折磨、对惊奇和特殊的偏爱、对场面作为一种保护隐私和个性之面具的嗜好……她画自己流血、哭泣、破碎,将痛苦移植到艺术里,她的画总是那么特别,那么个性化……弗里达犹如一个墨西哥彩饰陶罐,一个有着漂亮边饰的容器,里面装了糖果和惊喜,但注定是要被粉碎的。”^[3](P前言)] 根据传记改编的电影《弗里达》也影响不小,他们在翟永明内心势必激起某些共鸣。在感觉到女艺术家弗里达的疼痛、撕裂的同时,不断激发同样对绘画与艺术有冲动的翟永明的感触。她离异前的丈夫也曾是中国著名画家,其传播较广的代表作则是以她青年肖像而画成的作品《小翟》,这种生活的近似性,自然让她追问女艺术家的平凡与不平凡的坎坷命运。

笔者也曾翻译过英国当代著名女诗人帕斯卡尔·葩蒂的诗集《The Wounded Deer: Fourteen poems after Frida Kahlo》,^[4](P7~24)] 此部作品也是葩蒂向弗里达致敬的诗篇结集而成。弗里达·卡洛是通过色彩、线条展现现代女性痛苦折磨的身体,帕斯卡尔·葩蒂是通过身体知觉去感受、体验彼此契合的精神世界。翟永明同样在与弗里达·卡洛的灵魂对话中,表达出女性对自我及身体的命运追问与文化认同。与其说在写对弗里达一生身体多次切割、移植的同情,不如说是她在写同样作为知识女性、女艺术家们彼此惺惺相惜的艺术真情、感应之心。“在黑暗中 我的腿脚伸出/与卡洛跳舞/‘女人们:来,去/蜡烛烧毁自己的本性’//‘不必

管那眼神够得着的搜寻/卡洛,我们破碎的脊柱/服从内心性欲的主动’。”弗里达一生经历了身体疾病的折磨,但一生乐观、坚定,她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了许多带有自我印迹与独立签名的绘画经典,但是这一切创造的前提,都源于艺术家从对自身作为女性、艺术家的身份认同与超验之心。弗里达的创作是从她作为一个病人的身体的感受开始的,通过身体的知觉、感官体验,艺术家勾勒出有着鲜明自我强烈投射的超现实、魔幻色彩的现代作品。她们都是爱美的,并终生为创造美的作品而矢志不渝,“我,流离在五光十色之间/深入……浅出……//‘为了美,女人永远着忙’//请看体内的铁钉/在一朵忧郁烈焰的炙烤下/斑斓 怎样变成她胸前的雕花图案/”,诗人沉浸于艺术与美的创造的热情、想象之中,而这些身体所遭遇的创伤则构成了弗里达的艺术画像、自我想象,“蝴蝶一扑 飞过来/从卡洛冰凉的铁床上/闪光、金黄/吱吱响的四只车轮/目睹了这个女人的战场”,由此,更能理解翟永明对弗里达的特殊的内心感应与精神对话,也通过身体复杂而疼痛的一生,集中领略了两个艺术女性之间在思想上的情感共鸣与精神映照。她们彼此在对敬畏的艺术之维找到了某种精神感应与情感认同,绘画独特而又深刻的流动心灵。

城市文化空间的一系列作品中,她开始远离表象与日常的城市生活,而转向了知识、智力结构相联结的精神感应与心灵沉思,她的诗歌总会表现一种荡气回肠、起死回生的复古、怀旧色调,通过交错时空中的生命意识,表现出女性命运与性别之痛。在《三美人之歌》中以“红”“白”“黑”三个女性的情绪表达了不同的生命情境、遭遇的感受与体验。“红”:“我感到了来自远古的激情/仍在每一块石中潜行/仿佛是透过她的体内/当我站在这里,全身红色/背后是八万里晴天/在等待那一声摧毁性的哭泣。”“白”:“当我站在这里,一袭白袍/眼前是八百年的传说/把她的灵魂镇压在一座塔下”,“像那不可动摇的形象:‘为了我的情郎/与我腹中的孩子’她说。”“黑”:“在黑夜,黑透的深处/她比黑更黑,因为她/从阳间进入坟墓”;“如果他死了,我也不活着/用痛苦把石碑捣烂/呼吸死亡的新鲜味道/于是,在黑夜/为你叠被铺床”。“三美人”,写的是姐妹们的深情与命运忧患。

她在《十四首素歌——致母亲》中写道:“低头听见:地底深处/骨头与骨头的交谈/还有闪烁的眼睛奔忙/就如泥土的灵魂/在任何一种黑暗中/听见白昼时:雄鸡频频啄食 旁若无人”,与其说在写“母亲”,不如说是自己与母亲对话展现心灵感应,最终展示相异的性别与生理经验,以及“女性诗歌”独有的身体景观与文化想象,“使遥远的事物变得悲哀/使美变得不朽/时间的笔在急速滑动/产生字 就像那急速没落的河滩上/倾泻如注的卵……事物都会凋零/时间是高手 将其施舍/充作血肉的营养/精液流出它们自己的空间/包括临终时最后的一点”,对唯美的事物的召唤,对时间的凝视,这些都是“女性诗歌”的情感叙事,而其中灌注着强烈的身心感应与生命意识。“我只是/让幻想穿透我的身体/让一个命运的逆转成为我骨髓的思想”,“离别是一把刀 等待/男人的心入鞘/而女人掌握了使它流血的技巧”,“在母体的小小黑暗中/还是在世界广大的白昼中”,“母亲”作为女人的一生,隐喻了诗人自己的痛楚与艰辛,诗中布满了女性身体的局限的沉思与悲哀,“我用整个的身体倾听/内心的天线在无限伸展/我嗅到风、蜜糖天气/和一个静态世界里的话语”,与其说在刻画“母亲”,勿如说她在反思现代“女性”命运。当下文化主体无疑表现为男权中心的社会话语,他们获得某种性别优势与特权,“女性”在社会主体中备感缺席。她们必须要通过主动争取、积极抗争才可获得,而“女性诗歌”及其背后的文化意识成为获得社会平等、身份认同的文化路径,但这个过程并非容易,因而身体书写表现这种心灵的无助与窘境。“终于一种不变的变化/缓慢地,靠近时间本质/在我们双肘确立的地方”,“于是谈到诗时 不再动摇”,可见,“母亲”这一生正如“诗神”一样,引导她凭借诗歌获得文化空间的“签名”,但诗歌毕竟是一种理想型的话语状态,不能让诗歌变成生活,她们走向内心的丰富体验中更感受到自我的缺席与无助。“写作。这一行为将不但‘实现’妇女解除对其性特征和女性存在的抑制关系,从而使她得以接近其原本力量……她的喉舌,以及她那一直被封锁着的巨大的身体领域;写作将使她挣脱超自我结构”,^{[2](P194)}在场的身心感应与文化诉求,形成了翟永明对城市空间的警惕与心灵距离,从外部世界的身体感应转向自我命运的沉思,这也彰显 90 年代“女性诗歌”的现场性、差异性、丰富性、可能性。

90 年代“女性诗歌”身体景观的展示与联想,表现出活生生的城市文化的现场性、文化性。在语言的艺术

维度,翟永明也更追求诗的陌生化与张力。她在《周末与几位忙人共饮》中写道日常的文人雅集、相邀,但不同于一般的社交场合,她们沉浸于消费文化与都市空间的思考,通过女性独特的敏感视角,捕捉、挖掘、呈现、揭示现实性危机中现代焦虑与虚无面孔,“他们平面的脸 实际很痛/我们内心已被揉成一团碎屑/——被训练有素的艺术/被置身其中的环境、文脉/被晚餐以及蜡烛/被忙碌的大脑和聊天”,显然,她们的性别经验绝大多数来自日常、交流,在身心感应中,不断彰显城市繁荣与喧嚣背后的冷漠与寂寥,身体与内心进行有效对话。

都市化的身体书写与 90 年代消费文化密切相关,城市文化空间的景观呈现出某种寂寞与空虚。翟永明写道:“阶梯下 涂了黑漆漆的/矩形铁网 把醉/变成死 生/躺在草丛中/等待洁净的时刻……//我们都是沙子 存在/才是水泥 甜蜜的生活/充满肉身的肥美/三者足以引导怎样的经验?”她通过这种带有内心疼痛醉意话语的身心感应,最终实现对形而上的主体价值的认同。身体之“醉”与存在“思”之间形成内在感应,让身体的现实境遇转化为现代性的观照与反思。

翟永明 90 年代的诗歌也通过身体的外部观察呈现出对艺术、审美的沉思与体验。“水在哪儿/水在世界上拍打/现在 我必须造水/为每一件事物的悲伤/制造它不可多得的完美”(《潜水艇的悲伤》),“她们控制自己/把灵魂引向美和诗意/时而机器,时而编针运动的声音/谈论永无休止的女人话题/还有因她们而存在的/艺术、战争、爱情——”(《纺织与形为之歌》),日常细节与城市空间交汇一起,再现了日常化、生活化、女人化、情感化的都市文化,同时,她又跳出女性的自我,展开了身体体验与形而上学思考,让诗歌最终回归语言本位的诗体意识,所涉及的身体感应也变成诗的唯美与纯粹。

从现实中追问“女性诗歌”的性别属性与身份认同:“爱的本质/我们就要像某些动物般/互相吞吃 大片的云想要/托起我们奔跑”(《去面对一个电话》),“黑夜向我下垂/我的双腿便迈得更美/我来到何处?与你相遇/你这怕人的温驯的东西/当你盯着我我盯着你/我们的目光互相吸引”(《壁虎与我》),翟永明体现出生活审美化的日常追求,也暗藏现代性焦虑与迷茫意识,这种意识来自于现代社会对人的心灵的现实挤压,呈现了虚无、无助,“我们越是为虚无所纠缠,那犹如深渊般在我们四周张开大口的虚无,或者越是为追踪我们的千万桩事务和人事所烦恼,那失却了形式、没有灵魂和爱的种种,我们的反抗就必然越发富有激情、越猛烈和强暴。”^{[5](P395)} 翟永明 90 年代诗歌除了日常化的语境透析、再现,还重视其深度情感的挖掘,传承她早期诗歌独白所表现出来的哲学气质,对死亡、孤寂、虚无、绝望等终极情感展开了形而上学的探索,不断从日常的、都市的身体在场转向丰富的、可能世界的思想认同。

90 年代,她们表现出自觉的语言本体意识,不断从再现的、叙事的话语中转向诗体、诗学意义上的书写实践,逐渐形成了语言机智与成熟。她追求深度的灵魂震颤,自觉地审视“女性”的文化地位,将差异的性别书写融入人类“自我”的终极关怀,推动 90 年代以来“女性诗歌”的深度和难度。

但是,身体的娱乐化与消费性也折射出 90 年代女性诗歌写作的空洞性与虚无意识。“口语写作”在叙事中运用“反讽”策略,但是过多使用与重复运用,导致了话语的雷同化、复制化的写作误区。

三、“女性诗歌”:身体与诗体的实践

除了翟永明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有效书写,90 年代“女性诗歌”还包括唐亚平、王小妮、虹影、海男、陆忆敏、安琪等人,她们返回语言、传承传统,在“身体”与“诗体”间建构某种平衡。她们从激进的文化立场转向女性差异经验的女性写作发展。身体书写,也慢慢表现出语言主体的诗体意识,“身体”从狭隘的性别视野转向了诗人“自我”命运的终极之问与现代之思。但是,90 年代诗歌的“叙事性”必然密集运用“反讽”这个文本策略,但是“反讽”话语背后折射了 90 年代消费文化与文学书写中的“虚无”意识。

相对不足,90 年代“女性诗歌”,从翟永明、海男、虹影等创作中,呈现出女性自身的敏感性、差异性,推动、丰富了 90 年代以来的当代诗歌书写。包括如下几点特点:

第一,90 年代“女性诗歌”以女性独特的性别经验书写差异的内心世界,表现时代、城市、现实、文化语境

对女性自我的身份挤压及现代焦虑。

“三个女人/一个穿红/一个穿白/一个周身裹满黑色/并肩而行/她们的目光有时割破空气/有时又穿过那些光亮/繁衍自己的同类/连同她们内心的颜色”(翟永明:《三美之歌》),她意识到要突破身体的虚无意识,重视日常经验与都市空间的形而上学的思索,不断呈现出现代生活的女性回归与自我期待,她们“关注与表现女性私人经验,特别是女性性经验”。^{[6](P204)}90 年代“女性诗歌”反映物质、消费生活对女性的外部挤压与她们在艺术追求上的疏离感,她们重视日常经验、性别经验,也展示女性自我追求的艰辛与无助。

90 年代“女性诗歌”整体上没有 80 年代诗歌的精神上的高蹈与紧张,但也因叙事性过度所导致语言诗性的丢失。因此,她们在展示女性趣味与性别书写的同时,也同语言搏斗、维系语言本体的诗体意识。显然,她们不得不经受时代、社会语境的重重挤压,也表现出精神上和文化上的迷茫感、失落感。这种虚无意识与 90 年代文化中的消费主义、物质主义密切关联。

第二,90 年代“女性诗歌”回归语言本体,在诗学建构中参与了当代诗歌书写,推动当代诗学的理论进程。

90 年代女性的经验书写更加重视回归语言本体的诗艺、诗体意识,90 年代主流的“口语写作”中,她们自觉对叙事性、反讽性话语进行疏离,尽管难以完全剥离 90 年代女性诗歌受叙事性的影响,但是,90 年代这些女性诗人代表,在叙事这个转型中,还是自觉探索叙事与诗意的联结,探索现代诗歌的传播与书写的文本效果与各种可能。

这些“女性诗歌”也表现出“知识分子写作”的文化征兆,践行了文化自我这一身份担当,将自我导向身心感应与超验的象征写作,坚持语言的本体意识与诗歌精神,克服 90 年代消费文化所表现出来的虚无性,与政治的自觉疏离,丰富、拓展诗艺的表意空间,真正推动 90 年代以来的当代诗歌书写及其理论建构。

第三,90 年代“女性诗歌”推动了同期文化的生长,使得“女性诗歌”较好地参与了 90 年代文化的建构与反思。

“女性诗歌”变成 90 年代文化的一扇窗口,隐约可见同期文化的文化生态与精神现状,“从九十年代女性诗歌写作的窗口,不仅可以窥视到历史转型期人们在社会心理、价值观念、思想意识等方面发生的变化,亦可以透视到整个九十年代诗歌所发生的变化”。^{[7](P10)}“女性诗歌”也成为 90 年代的差异的、独特的文化风景线。90 年代“女性诗歌”的文化回归,主要表现为她们突破女性性别文化批判立场,回归“去性化”的女性主义写作,在“去性化”的性别经验中完善、丰富 90 年代诗歌。“女性写作则是抛弃了与男性的对抗,而将目光投向所有差异存在的领域,并在写作中对造成诸种本质差异的社会文化政治心理因素进行反思与纠正,从而必然形成追求同一性的一种反本质主义写作。”^{[7](P14)}

通过对翟永明为个案的考察,不难发现 90 年代女性从“被看”的文化地位走向了“去性别化”的平等书写;翟永明除了写诗,也创办“白夜”酒吧,并以此为文化的根据地不定期组织、策划各种小型的书面艺术展、诗歌朗诵等文化活动,推动了地域的文化积极建构发展,诗歌的影响也逐渐由诗歌向文化散播。90 年代的海男参与了创作大型文学期刊《大家》,扩大了文学的文化影响,推动了同期文化积极健康的发展。

第四,90 年代“女性诗歌”转型也折射出 90 年代文化的大众化、消费化发展的表征与趋势,其背后渗透的“虚无意识”,值得警惕。

90 年代“女性诗歌”被强烈关注,无疑与同期大众文化中的娱乐性、消费性密切关联,女性诗人的大量出现,使得“女性”这样的性别身份转化为文化性别,她们通过一种强烈的女性主义写作来抵抗与解构男性为主导的文学性别、文化认同,她们通过女性特别的敏感与直觉,抒写内心的独白与沉思。女性写作的较少性,也使得女性诗歌备受外界关注,诗歌毕竟是精英的艺术,女性写作的大量加入与推进,使得女性写作变成了 90 年代的独特文化景观。而“身体”又成为其写作的感应器官,她们通过对身体的强化,让“身体书写”成为 90 年代的重要文化景观,其背后也渗透着她们的极度压抑与自我摧毁的强烈冲动,这种女性特殊的身体书写无疑构成了 90 年代文化的反叛与颠覆。但整体时代氛围与她们身份背后所濡染的“虚无意识”,的确也彰显了“女性诗歌”的艰辛与偏颇。

这种“身体”的写作,也可能走向负面、否定的误区,过分地对“身体”的展示,自然迎合娱乐文化与女权意识,势必会影响到语言本体的写作,甚至有走向以“女性”为话语中心的文化激进立场,值得警惕。

翟永明的写作,呈现了90年代“女性诗歌”的局部面貌与文化印迹。城市空间的诗歌书写,吻合90年代的物质、消费文化的转型与趋势,但是,“叙事”的过度书写必须导致了诗意的丢失,“反讽”叙事其后则渗透着文化上的颓废与“虚无”,这种颇具“文化刺点”意味的城市书写,也成为90年代以来的文化吊诡与时代悖论。



[责任编辑 廖智宏] [责任校对 蓝肖杏]

[参 考 文 献]

- [1]翟永明.再谈“黑夜意识”与“女性诗歌”[J].诗探索,1995(1).
- [2][法]埃莱娜·西苏,著,张京媛,著,孟悦,译.美杜莎的笑声[A].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 [3][美]赫雷拉,著,夏雨,译.弗里达[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 [4]Pascale Petit, The Wounded Deer: Fourteen poems after Frida Kahlo[M].Smith/Doorstop, 2005.
- [5][德]荷尔德林,著,戴晖,译.荷尔德林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 [6]陈定家.身体写作与文化症候[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 [7]赵彬.断裂、转型与深化——中国九十年代女性诗歌写作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

[作者简介] 董迎春(1977~),江苏扬州人,文学博士,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创意写作、当代西方文论、中西诗歌。广西南宁,邮编:530006。

Body Writing and Culture Nihilism in 1990s' Female Poetry:

Based on the Poetries by Zhai Yongming

DONG Ying-chun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Nanning 530006, China)

Abstract: Since 1990s, the poetry writing of Zhai Yongming has shifted from night monologue in her early period to urbanization discourse since 1990s. The female consciousness and the body presence of individual experience break the early lyric monologue and narcissistic pity, constantly lifting female body to the height of metaphysical, intellectual, comprehensive and ideological level. When her poetry writing deconstructs the sense of emptiness hidden behind life and integrates the poetic expression based on language, the spiritual essence and cultural influence of female poetry are promoted. From her works it is easy to detect a strong cultural nihilism filled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aterial consumption culture during the whole 1990s, which is worthy of vigilance.

Key Words: female poetry; body writing; Zhai Yongming; cultural nihilism